《国际政治研究》(双月刊)2016 年 第 1 期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三波?

李 巍 刘 玮

内容提要 在过去 40 多年的时间里,国际政治经济学先后经历了宏观层次的范式辩论和中观层次的开放经济政治学两个学科发展阶段。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和 2010 年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又一次重塑了国际经济秩序。由于支持开放经济政治学这一研究路径的单极霸权结构逐渐坍塌,学界开始全面反思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分析框架在新时代的局限性,并试图重新找回体系结构、国家权力和理念冲突等因素对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塑造作用,并且强调由"方法导向型"向"问题导向型"的研究转变,这促使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三波知识浪潮的到来。

关键词 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经济秩序 金融危机 开放经济政治学

20 世纪 70 年代,国际经济秩序的混乱刺激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作为国际关系学一个新的分支领域的诞生,第一代

* 李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邮编:100872);刘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邮编:100732)

** 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 2014 年度明德青年学者项目"人民币国际化的政治基础研究"(项目编号:14XNJ006)的成果之一。感谢陈兆源、吴雁飞、康杰和《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详细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学者围绕国际体系层次上的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关系展开了激烈而丰富的范式辩论,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早期的主要理论流派。20 世纪 90 年代,冷战的结束再次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重组,在经济全球化和美国单极霸权的新时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代学者开始超越体系层次的范式辩论,致力于整合国际经济和国内政治两个分析层次,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进入了一个被称之为“开放经济政治学”(Open Economy Politics, OEP)的新阶段。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和 2010 年欧洲债务危机再次促成了国际经济秩序的革命性变化,西方世界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遭遇前所未有的动摇,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占据主流地位并持续了 20 年的开放经济政治学的研究路径和分析框架在解释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时面临诸多困境。在对开放经济政治学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在研究议题和研究视角上呈现出一些超越之势,可能预示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三波知识浪潮的到来。

本文首先探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两次国际经济秩序重大变迁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发展历程的关系,然后分析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和 2010 年欧洲债务危机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二波主要的知识成果——开放经济政治学——在解释国际经济关系变迁时所造成的冲击,进而尝试性提出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第三波知识演进中可能的几个发展方向。

一、国际经济秩序变迁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发展

通常而言,社会科学领域的每一次知识爆炸,都与现实世界的革命性变化密切相关;正是现实世界的重大变化暴露出原有知识体系的局限与不足,从而促进新知识的产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与发展也遵循同样的规律,每一次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迁都给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动力。

(一)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辩论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美国经济霸权的衰落,促成战后资本主义“黄金发展周期”长达 20 年之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崩溃,国际经济秩序进入了一个“礼崩乐坏”的混乱时期。这一时期,美日欧经济竞争不断加剧,石油危机和经济滞胀先后冲击世界经济;与此同时,大西洋两岸经济相互依赖日渐加深,跨国公司作为一种新的国际行为体日益活跃。面对这些全新的国际问题,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范式开始呈现诸多困境。来自不同学科的相关学者牢牢抓住

这个机会,突破学科界限所构筑的藩篱,积极探索国际体系中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促使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诞生。①

美国经济霸权衰落构成了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初创时期的基本背景,直接引发了当时的学者对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忧虑。以哈佛大学教授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和斯坦福大学教授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衰落的霸权将无力维持国际经济体系的开放,战后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将因此面临不可持续的危险。② 他们对国际权力分配和国际经济的稳定与开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究,创立了著名的"霸权稳定论"。这一理论提出了可以操作变量,并明确建立了因果逻辑关系,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代表性理论成果。③

但是,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论也刺激了反对派的兴起。反对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所缔造的国际制度体系作为干预市场的另一种力量,其继续存在使得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在美国霸权衰落之后仍然能够得到维持,从而诞生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另外一大主流学派即自由制度主义。④ 从此,围绕国际制度有效性的争论便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学术议题,也是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理论之争。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体系中的权力分布控制着国际市场的发展方向,而国际制度学派认为,国际制度可以缓解国际政治体系中的无政府状态,抑制权力结构对于国际市场的干扰。

除美国经济霸权衰落外,当时国际体系所出现的另一个新现象就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增强,与此同时,部分发展中国家借助石油武器

---

① 1970年,苏珊·斯特兰奇的一篇文章被认为是揭开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序幕,参见 Susan Strange,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ase of Mutual Neglect,"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6, No. 2, 1970, pp. 304-315。

② 参见 Charles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Charles Kindleberger,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Exploitation, Public Goods, and Free Rid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5, No. 2, 1981, pp. 242-254; Robert Gilpin, *U. 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Stephen Krasner,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Vol. 28, No. 3, 1976, pp. 317-343。

③ 20世纪80年代,另一位更加年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戴维·莱克加入了"霸权稳定论"的学术阵营。参见 David A. Lake, *Power, Protection and Free Trad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U. S. Commercial Strategy, 1887—1939*,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④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重创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于是,另一场围绕国家权力与市场体系力量消长的辩论也在进行。市场的逻辑是强化分工和整体效率,而国家的逻辑是国家安全和单边福利,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的矛盾运动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又一个理论研究起点,并为此诞生了另外两个相互对立的流派: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也称现实主义)。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的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Cooper)和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认为,20 世纪 60、70 年代正在兴起的经济相互依赖使得国家权力日益屈服于世界市场的运作规律。① 在其影响下,以罗伯特·基欧汉为代表的部分国际政治学者强调世界市场和跨国行为体的兴起正在削弱国家的力量,从而导致传统的以权力政治为核心内容的民族国家体系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②

面对自由主义声势浩大的学术浪潮,以罗伯特·吉尔平和斯蒂芬·克拉斯纳为代表的国家主义者起而反击,他们通过实证研究,强调主权国家在世界市场中的自主行为能力,认为全球市场的扩张并没有削弱国家的力量,主权国家体系控制和管理着全球市场,进而催生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国家主义理论。③

总之,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面对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宏观理论辩论共同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和成熟,实现了之前相互分离的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在学科上的相互交叉,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的先驱,这两场辩论的主要参与者被称之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代学者"。④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教授本杰明·科恩(Benjamin J. Cohen)后来以"七贤人"为线索,总结了第一代学人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奠基性贡献。⑤

---

① Richard Cooper, *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 Economic Policy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 N. Y.: McGraw-Hill, 1968; Raymond Vernon, *Sovereignty at Ba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1.

②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7; Edward Morse, *Moderniz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6.

③ Robert Gilpin, *U. 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75; Steven D. Krasner,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s: Raw Materials, Investments, and U. 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④ 北京大学王正毅教授使用了这种提法,参见王正毅:《超越"吉尔平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1990 年代以来 IPE 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国际政治研究》2006 年第 2 期,第 26 页。

⑤ Benjamin J. Cohe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与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形成

进入20世纪90年代,历史的走向再次发生逆转。美国经济霸权的衰落不仅得到全面抑制,而且作为冷战的最终赢家,美国又全面引领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其综合实力在世纪之交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又一个新的顶峰。正是在美国的大力推动下,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深入,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断层线正在被统一的全球市场所弥合,《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宣称"世界是平的"。[①] 这标志着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在"两个平行市场"的竞争中大获全胜,全球化彻底取代冷战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生活的核心主题。在此背景下,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经历了一场重大的转型,并迎来第二次大发展的浪潮。新一代学者在研究议题、研究方法和分析视角上趋向融合,过去泾渭分明的宏观范式辩论逐渐走向低潮。

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化发展到新的高度,对国际市场整合和主权国家角色转变的讨论又一次活跃起来。一方面,全球化改变了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外部竞争环境,它不仅扩大了全球市场规模,还向所有国家施加潜在压力,并迫使其改变制度和政策,从而促使国家间政策趋同,包括贸易政策自由化、去除资本控制、开放金融市场并弱化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否则将会承担极大的成本;[②]另一方面,全球化对各国的国内政治带来深远影响。随着人员、信息、技术、资本和商品等经济要素的跨国流动的加强,社会个体日益融入全球生产—消费体系中,国内和全球的社会经济关联超越传统政治军事关系,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与个体的日常生活和收入息息相关。经济全球化对不同行业的利润、就业安全和工资收入都会带来影响,这些分配性后果最终会引发国内政治行动。[③]

以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海伦·米尔纳为代表的新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

---

① Thomas L. Friedman, *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21 Centu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5.

② Helen V. Milne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eyond Hegemonic Stability," *Foreign Policy*, No. 110, 1998, pp. 112-123.

③ Mark Andreas Kayser, "How Domestic Is Domesitc Politics? Globalization and Electio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0, 2007, pp. 341-362.

在借鉴老一代比较政治经济学者研究的基础上,[①]根据全球化带来的变化,重新建构了以国内社会行为体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研究新范式,它建立在三个基本假定的基础上:第一,社会行为体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行为体,以个体集合和私人组织为代表的社会行为体总体上是理性的和规避风险的,在资源稀缺、价值冲突和社会结构不断变化的约束条件下,通过交换和组织集体行动来追求各自的利益;第二,国家并不是一元行为体,国家是国内社会利益的代理机构。政府机构及其活动被看作个体和团体的社会权力和偏好转化为国家政策的"传送带";第三,国际体系是相互依存的,每个国家在其他国家偏好的约束下最大化地追求自身的政策偏好。[②] 在打破传统国家一元和国家中心假定的基础上,这一代学者顺应全球化与国内政治互动日益深化的新现实,围绕着经济开放的国内政治动力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国内影响(在个体、部门、生产要素层面的分配性影响)展开了十分丰富的研究。

新的研究成果强调打开国家这个"黑箱",围绕着"社会利益"和"国内制度"这两个核心概念,探讨国际经济体系与国内政治过程的互动关系,这一研究纲领被分解为三个标准化的环节:一是界定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偏好和利益;二是探究国内制度对社会利益汇集和政治权力博弈的作用;三是国内制度将国内社会利益汇总成国家利益,并授权中央政府通过政策工具努力在国际体系中推动这种利益的实现。

总之,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按照上述三个标准化的环节搭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各个主要议题进行了一系列开拓性的研究。在国际贸易领域,学者们对国内利益分化和民主制度对贸易开放政策的影响,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自由贸易协定(FTA)对贸易自由化的效果等问题展开了丰富的研究。在国际金融领域,金融自由化、汇率制度选择、国际金

---

① 比较政治经济学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兴盛于 80 年代,它的一项开拓性研究是康奈尔大学教授彼得·卡赞斯坦所主持的比较不同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集体研究,这项研究催生了通过国内利益联盟和决策过程的视角来探索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虽然其关键解释变量是国内层次的,但在国际关系学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卡赞斯坦的开拓性努力得到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彼得·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罗纳德·罗高斯基(Ronald Rogowski)等著名比较政治学者的积极响应。他们的代表作品参见 Peter Katzenstein, ed.,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 Ronald Rogowski,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E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② Andrew Moravcsik, "Taking Preferences Seriously: 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 4, 1997, pp. 513-53;〔美〕海伦·米尔纳:《政治的理性化:正在显现的国际政治、美国政治与比较政治研究的综合》,载〔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和斯提芬·克拉斯纳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2 年版,第 140—169 页 。

融监管合作和国际债务与借贷政治成为核心研究议题。在跨国投资领域,学者们对国内利益和制度对跨国直接投资(FDI)的影响、国际制度(双边投资协定,BIT)对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及跨国直接投资的政治效应进行了研究。在对外援助领域,学者们则集中对受援国的选择和援助条件的政治根源进行了研究。同时,第二代学者进一步拓展了关于全球化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及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问题的研究。

由于这些成果都探究以国内政治因素与国际经济开放的关系为主题,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戴维·莱克(David A. Lake)、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弗里登(Jeffry Frieden)和丽萨·马丁(Lisa Martin)等具有代表性的"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将上述这种分析框架和研究路径总结为"开放经济政治学"。① 开放经济政治学建立在两大核心概念基础("利益—制度")上,形成了统一的研究框架,建构起了具有逻辑一致性的研究纲领,使国际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更加成熟的交叉学科。

如果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波浪潮主要围绕着美国霸权衰退和经济相互依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来展开,那么,开放经济政治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兴起则是围绕着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对国家自主性的削弱和国内社会利益的刺激来展开。相比于第一波的范式辩论,开放经济政治学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最重大贡献,就是打通了国际与国内的界限,找回了被第一代学者们所忽略的国际体系运行的国内微观基础。不仅如此,开放经济政治学还在研究方法上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建构科学理论模型、通过大样本和跨国数据进行统计检验的实证阶段。总之,开放经济政治学极大地重塑了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

① 对于这一概念的最早使用,参见 Robert H. Bates, *Open Economy Politic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ld Coffee Trad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对这一分析框架的总结,参见 David A. Lake, "Open Economy Politics: A Critical Review,"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4, No. 3, 2009, pp. 219-244; Jeffry A. Frieden and Lisa Mart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Global and Domestic Interactions," in Ira Katznelson and Helen Milner, eds.,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New York: W. W. Norton, 2002, pp. 118-146; David A. Lak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 Maturing Interdiscipline," in Barry R. Weingast and Donald Wittma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pp. 757-77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二、单极结构与开放经济政治学的现实背景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代学者”通过分析国内社会行为体对经济全球化的政策偏好及这种偏好如何通过国内制度汇集为国家对外经济政策,成功地将国内政治过程纳入国际经济关系的分析中,实现了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融合。但是,开放经济政治学不自觉地将国际层次的宏观政治结构、权力竞争和安全压力在自身的研究中悄悄地“丢弃了”。这使得开放经济政治学在向比较政治经济学靠近的过程中,越来越丧失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应有特征。开放经济政治学的这种特征演变,与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经济全球化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的核心国际政治背景是冷战后美国单极霸权结构的形成。① 冷战结束在意识形态方面被福山认为是“历史的终结”;②而在权力结构方面,则被认为是“美国无敌”的开始。③ 美国在全球强大的权力和价值优势是经济全球化能够迅速扩散的根本政治动力。虽然科学技术的进步让信息、资本、商品服务和知识的跨国流动变得容易,但美国在联合其他发达国家推动全球金融的去管制化和全球贸易的自由化浪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冷战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当之无愧的“缔造者”。④

正是这种无以匹敌的单极霸权结构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国内转向,使得国际关系中的权力结构、地缘政治、安全压力和价值冲突等核心内容逐渐淡出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的视野,而是被国内分配政治所取代。尽管单极结构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国际政治基础也很少被开放经济政治学提及,但它从以下四个方面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历史性转向。

---

① 对单极霸权结构的讨论,参见 Edward D. Mansfield, “Concentration, Polar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7, No. 1, March 1993, pp. 105-128; William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Summer 1999, pp. 5-41; Robert Jervis, “Unipolarity: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January 2009, pp. 188-231。

②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③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Stephen Brooks and William Wolforth, “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Vol. 81, 2002, pp. 20-33.

④ 达特茅斯学院教授迈克尔·马斯坦多诺(Michael Mastanduno)把美国称为国际政治经济体制的体系创造者(system maker)和特权拥有者(privilege taker),参见 Michael Mastanduno, “System Maker and Privilege Taker: U. S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World Politics*, Vol. 61, 2009, pp. 121-154。

首先,美国因其超强实力而被认为是一个“孤独的超级大国”,[①]这种单极结构从实质上改变了大国之间互动的基本模式,极大地增强了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自主性和灵活度。美国霸权削弱了国际体系中政治冲突的烈度,带来了所谓“霸权治下的和平”,并且扩大了霸权国对于各国行为选择的影响,其他国家不自觉地受到美国对外政策选择的影响。因此,开放经济政治学将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作为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核心主题进行研究,其潜在的逻辑是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塑造了整个国际经济体系,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货币金融政策、投资政策和移民政策等都会外溢和扩散到全球范围,进而塑造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格局。

其次,在美国单级霸权结构之下,美国所面临的国际安全压力降低,这进一步释放了美国自身“多元主义”和分权制衡的政治特色,强化了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②] 霸权国家由于受到的外来压力较小,在对外政策中更有能力摆脱体系结构的束缚,但是作为民主国家,体系压力的减小反而刺激了国内行为体的活跃,进而凸显了国内政治的重要性。这种国际政治背景进一步彰显了斯蒂芬·克拉斯纳所说的美国“对外强大、对内虚弱”的制度特点,从而使得美国成为在对外经济决策中受国内政治影响最大的国家。[③] 因此,开放经济政治学基于美国特殊的霸权地位和“多元主义”的国内政治结构,发展出了“利益—制度”的分析框架,强调国内政治过程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塑造作用;相反,在单极结构下国际体系层次上的安全压力和利益冲突,对于影响国际经济关系的演进,已经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力量。

再次,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采取所谓“仁慈”的霸权政策,致力于通过建构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领导世界。[④] 冷战结束后,“两个平行的市场”被“统一的全球市场”所取代,包括中国、苏东国家都积极融入美国领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国际层次上围绕国际经济秩序、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理念的争端告一段落。美国一手缔造的国际制度体系被认为是保障和平与促进发展的重要

---

①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Lonely Superpower,” *The New Republic*, Vol. 205, No. 5, Jul 29, 1991, pp. 23-27; Samuel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2, 1999, pp. 35-49.

② 参见李巍:《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六章。

③ Stephen D. Krasner, “United States Commercial and Monetary Policy: Unravelling the Paradox of External Strength and Internal Weaknes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1, No. 4, 1977, pp. 635-671.

④ 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Kenneth W. Abbott and Duncan Snidal, “Why States Act through Form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2, No. 1, 1998, pp. 3-32.

积极力量,这促进了整个开放经济政治学将支持和保障这一秩序的正式“国际制度”奉为研究圭臬,并且强调国际制度在促进合作中的中立性,无视制度背后的权力性质。

在美国的领导下,各个领域的国际制度经历了战后几十年的发展而日渐成熟,在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各国对于多边规则的执行更加普遍。在国际贸易领域,美国领导“乌拉圭回合”谈判最终促使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大大增强了贸易领域的制度化。① 在国际货币领域,美国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转型,使其从一个汇率监管和维持短期国际收支平衡的多边机构演变为金融危机救助、宏观经济协调和资本流动管理机构,并推动了国际货币事务的法律化。② 在国际金融领域,美国规定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巴塞尔协议达成,并不断升级更新。可以说,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的各个议题领域,冷战后国际制度的治理能力都得到了加强,美国主导的国际主义和多边主义国际规范在国际协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第一代学者”创造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的大厦上,开放经济政治学集中对国际制度中的遵约行为、委托—代理问题、承诺的可信性及争端解决机制推动国际合作的具体机制进行了大量研究。③ 但是,国际制度一直被开放经济政治学视为中性的机制进行研究,而现实主义所一直关注的权力政治在国际制度形成和演化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国际组织非中性的分配政治效应都被开放经济政治学所排除在外。④

最后,冷战结束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在全球知识界和政策界的伟大胜利,而 1997 年东亚金融危机终结了“东亚奇迹”,被认为是宣告了“发展型国家”理论的破产,⑤这使得开放经济政治学在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上完全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俘虏”。

---

① 国际贸易组织相对于“多边临时性”的 GATT 在“非歧视”原则的规则化和争端解决机制的“硬化”方面都得到了发展。王勇:《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04 页。

② Beth A. Simmons, “International Law and State Behavior: Commitment and Compliance i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ffair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2, Vol. 94, No. 4, pp. 819-835.

③ 2005 年 2 月,罗伯特·基欧汉的学生们在普林斯顿大学聚会,集中研讨新自由制度主义在开放经济政治学研究议程下的前沿进展,参见 Helen V. Milner and Andrew Moravcsik, eds., *Power, Interdependence, and Nonstate Actors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④ John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1994/1995, pp. 5-49.

⑤ 发展型国家理论将东亚奇迹视为高效的国家干预发挥作用的结果,参见 Peter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开放经济政治学以国际经济开放和经济自由化为研究主题,探究国际经济开放的国内政治动因和国内影响。由于民主化的“第三波”伴随着自由市场的扩张而高歌猛进,对民主制度和国际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研究也便成为其最核心的研究课题。① 这一研究取向明显受到当时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影响:一方面,20 世纪 90 年代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广为传播,成为全球主流的发展理念,也广泛用于转型国家的政治实践;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新古典经济学蓬勃发展,而凯恩斯主义则全面走向衰落,一直致力于借鉴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将当时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包括理性选择的基本研究方法引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乃是理所当然。因此,有学者指出,开放经济政治学在“华盛顿共识”时代达到顶峰并不是偶然。②

总之,作为一种在冷战后大行其道的研究路径和分析框架,开放经济政治学产生于“美国无敌”的现实背景之下,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二波浪潮的核心成果。单极霸权的国际政治结构削弱了体系层次上的权力政治斗争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释放了民主国家的国内政治力量,终结了国际经济制度的意识形态和理念之争,这为开放经济政治学开辟一条国内政治的研究路径提供了重要基础。但随着国际权力结构的新一轮重大变换,单方面强调国内政治的开放经济政治学正在遭遇越来越大的理论困境。

三、金融危机与开放经济政治学面临的困境

2008 年,美国爆发严重金融危机,随后欧洲也爆发债务危机,它给整个国际体系的演进带来了深远影响,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发生了一场深刻的转型。一方面,两场危机加速了美欧经济霸权的衰落和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促使整个国际权力结构进入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重组;另一方面,美欧危机刺

---

① Helen V. Milner and Keiko Kubota, “Why the Move to Free Trade? Democracy and Trade Policy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No. 1, Winter 2005, pp. 107-143; Nathan M. Jensen,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Political Regimes and Inflow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7, No. 3, Summer 2003, pp. 587-616; William Bernhard and David Leblang,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Exchange Rate Commitmen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3, No. 1, Winter1999, pp. 71-97.

② Daniel W. Drezner and Kathleen R. McNamara,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Global Financial Orders and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11, No. 1, 2013, p. 157.

激了国际社会开始反思美国主导的思想观念体系和国际制度体系的有效性，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中的统治地位遭遇的挑战日益增大。这两场危机给国际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开放经济政治学所不能解决或者未曾涉及的新问题，从而促使学科的嬗变。

（一）金融危机与秩序变迁

尽管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由于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各种地区性金融危机时有爆发，但它们都发生在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带，并没有从根本上冲击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整体架构。但是，作为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最为严重的危机，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与 2010 年接踵爆发的欧洲债务危机，共同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发生了一场历史性的变迁。

首先，美国金融危机加速了国际权力的流散，支撑传统国际经济秩序的单极政治结构正在快速坍塌，美国经济霸权的衰落再次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必须直面的问题。罗伯特·吉尔平曾经指出，美国的全球霸权主要由三根支柱构成，即美国的核武器（军事力量）、跨国公司及以美元地位为代表的金融力量。[①] 这次金融危机对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造成了相当大的打击，不仅使几乎所有美国金融机构都遭受重创，阻碍了其全球扩张的步伐，也令美元的国际地位受到质疑，国际社会“去美元化”的步伐逐渐加快。[②] 不仅如此，美国金融危机也进一步暴露了美国在公共部门融资能力、财政赤字和国内改革方面面临的压力。[③] 与此同时，新兴国家在经济上实现大规模崛起，这可能是 21 世纪区别于 20 世纪最根本的特征。在多个经济指标上，以中国为代表的主要新兴国家开始不断跻身排名前十的行列。在既有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明显脱节，实力与权力越来越呈现出一种不匹配的格局，这成为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第一动力。

其次，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主导的既有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诸多不足。

---

① 〔美〕罗伯特·吉尔平：《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钟飞腾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29 页。

② Eric Helleiner and Jonathan Kirshner, eds., *The Future of the Doll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③ 在中短期内，美国仍然可能保持综合实力的全面优势，在军事、科技、地缘政治、人口结构等方面的优势尤为明显。参见李晓、李俊久：《美国的霸权地位评估与新兴国家的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1 期，第 114—141 页；Bruce Jones, *Still Ours to Lead: America, Rising Powers, and the Tension between Rivalry and Restraint*,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4。

两场危机使得国际社会对更大范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国际金融救助、资本跨国流动管理、国际金融和主权债务监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需求增加,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治理机构和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政策网络既不具有足够的包容性以吸纳更多的新兴力量,也不具有足够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来协调各国采取强有力的集体行动。全球经济治理的政治基础日益弱化,如何从以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国际治理体系,转向更广泛参与和高效运行的治理体系,成为国际经济体系面临的重大挑战,其中的核心问题在于美国和欧洲需要向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进行一定的权利让渡。①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大变化是二十国集团取代排他性的七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核心平台,②但二十国集团在制度化建设方面还面临重大挑战。③ 二十国集团更大意义上是各国领导人进行政策协调的网络和平台,具体的规则制定和政策执行都是由正式的国际金融机构来实行。但是,既有的正式国金融机构的改革却面临各种障碍,尤其是美国国会不断拖延表决本已达成的改革协议,从而削弱了其治理的合法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国际贸易、国际货币和金融及跨国投资等各个领域,各国竞相通过谈判建立新的双边和地区合作网络,美国一统天下的国际制度体系开始出现各种"裂纹"。在贸易领域,随着多哈回合迟滞不前,世界贸易组织的权威性不断下降,各种区域性的自由贸易谈判(FTA)不断兴起,大有取全球多边主义而代之之势;在货币领域,金融危机之后各新兴国家加强了本币国际化的进程,美元的主导地位不断遭遇挑战;在金融领域,各种双边的货币互换、区域外汇储备机制和区域开发银行不断成立,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金融职能构成了替代效应;在投资领域,各种双边投资协定的大量涌现也凸显了缔结全球统一的投资协定更加遥遥无期。这种日益"碎片化"的治理格局使得原来隐藏在多边制度之下的权力政治"冰山"都显露出来了。尤其是崛起的中国正在通过积极有为的经济外交努力,在贸易和金融领域,推动既有的全球性制度改革(简称"改制")和积极进行大规模的区域性制度建设(简称"建制"),从而在一

① G. John Ikenberry, "Quest for Global Governance," *Current History: 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World Affairs*, Vol. 113. No. 759, 2014, p. 18.

② 崔志楠、邢悦:《从 G7 时代到 G20 时代》,《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 年第 1 期,第 134—154 页。

③ 王勇、刘玮:《新兴力量的崛起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中国战略观察》2012 年第 3 期,第 41—53 页。

定程度上重现了国际制度竞争的图景。① 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国内政治路径导致其难以回答当前关于国际制度变迁的诸多问题。

两场危机凸显了既有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在包容性、行为能力、权威性和合法性等多方面的不足,大国之间的权力政治在重新加剧,尤其是体现在国际规则竞争方面,整个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再次出现“礼崩乐坏”之后的秩序再造。

最后,美国金融危机削弱了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合法性,使国际社会进入新一轮的经济治理和发展理念的“重构期”。一方面,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激发了国际社会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反思,以“资本自由化”为导向的国际金融监管规范和跨国资本流动管理规范在危机后都出现了逆转。在二十国集团和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主导下,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相结合的“第三版巴塞尔协议”替代了以放松金融管制为核心的安格鲁-撒克逊监管模式。② 而作为资本项目自由化忠实鼓吹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改弦易辙开始承认资本管制对资本流动管理的有效性。③

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也提升了“发展型国家模式”的合法性与影响力。④ 在全球化浪潮下,部分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国家抵制国际经济组织所施加的经济自由化压力,在经济转型中坚决捍卫国家经济政策的自主性,通过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引导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国际竞争中显示出优势,这种国家引导的发展模式的成功也引起了知识界对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发展模式的疑虑,使得不同经济理念的竞争重新回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题之中。⑤

不仅如此,在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中,为了开展金融救助和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内的各主要国家政府都对市场进行了大规模干预、救助和刺激,这种行为明显打破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对政府行为的框

---

① 对于中国的“建制”和“改制”努力,参见李巍:《人民币崛起的国际制度基础》,《当代亚太》2014 年第 6 期,第 4—30 页。

② Eric Helleiner and Stefano Pagliari, “The End of Self-regulation? Hedge Funds and Derivatives in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in Eric Helleiner, et al., eds., *Global Finance in Crisis: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Change*,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 74.

③ Jonathan D. Ostry, et al., “Capital Inflows: The Role of Controls,” IMF Staff Position Note 10/04, 2010, Washington, D. 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④ 吴澄秋:《经济治理理念结构的变迁:兼论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国际观察》2003 年第 1 期,第 31 页。

⑤ Cornel Ban and Mark Blyth, “Dreaming with the BRICS?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and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0, No. 2, 2013, pp. 241-420.

定。而新兴经济体的政府外汇储备和主权财富基金对于稳定国际金融市场发挥了重大作用,实质上在危机中帮助维持了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①]这进一步凸显了国家导向的经济模式在全球化时代仍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美欧两场危机的爆发及其持续性的影响,推动了国际权力的流散、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变革和经济治理理念的重构,标志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美国单极霸权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走向瓦解。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内部的一种主流研究路径和分析框架,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国际政治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对于现实世界重大问题的解释力愈显贫乏。

(二)开放经济政治学的挑战

开放经济政治学的核心研究纲领是探索国内政治过程与国际经济开放的互动关系,基于社会集团之间的国内分配政治替代国家之间的国际分配政治成为全球政治经济事务的核心,国家成为国内社会压力的代理者,而主要不再是国际体系中自主寻求权力与财富的一元行为体。但是,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改变了开放经济政治学这一研究路径所依赖的国际政治现实环境。国家间围绕全球经济治理的冲突与协调、国家对于市场体系的干预和引导,以及全球经济理念的变革,开始成为影响国际经济关系的主题,但这些主题显然无法被纳入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分析框架。两场危机暴露出开放经济政治学的日益封闭和简化主义在理论解释力上的限度,这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共同体开始正视"利益—制度"这一核心分析框架所面临的各种挑战。

1. 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利益学说面临挑战。开放经济政治学根据新古典经济学推导出的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利益概念,建立在理性演绎的基础之上,非常便于进行精确观察和界定,这被视为开放经济政治学的重要创新。[②] 但是,正是简单化地引入新古典经济学来界定行为体利益,使得开放经济政治学对行为体偏好的复杂性和多元性重视不足,进而影响了对全球经济与国内政治互动的理解。[③]

---

① 新兴经济体的主权财富基金在危机中为美国的金融公司提供了248亿美元,这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何一个季度对欠发达国家的救助都要多。Herman Schwartz, *Subprime Na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11.

② David A. Lake, "Open Economy Politics: A Critical Review,"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4, No. 3, 2009, p. 226.

③ Jonathan Crystal, "What Do Producers Want? On the Origins of Societal Policy Preference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9, No. 3, 2003, p. 408.

第一,开放经济政治学根据经济政策在开放条件下的分配效应来界定个体的政策偏好,忽视了行为体的信息获得和认知因素对于偏好形成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个体偏好的前提假定,建立在社会行为体处于信息完全和知识充足的基础之上,并能够理性地判断出经济政策对自身利益的影响。但在现实生活中,姑且不论经济学界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很难达成共识,[①] 无论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还是政治体系中的选民,面对现实政策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往往都很难确切地判定自身利益。只有在利益重大且明确可见的情况下,从自我利益的角度解释行为体态度才比较可取。[②] 而现实中的国际政治经济议题往往比较复杂,因果链条很长,而且其国内分配效应并不总是十分明显。比如,一项对美国贸易政策偏好的研究发现,确定自身对贸易政策的偏好所需信息的代价十分高昂,不少民众对于贸易政策的偏好是"不知情的",低技术劳工、穷人和妇女对于贸易保护对自身的影响更是知之甚少。[③] 对国际金融政策的研究也发现,国内金融部门并没有按照开放经济政治学所推断的那样,根据自身在全球经济中的资产配置确定政策偏好,一些社会行为体对替代性政策并没有明确的偏好,甚至持有相反的政策偏好。[④] 正是由于个体很难界定自身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及特定国际经济政策中的利益,开放经济政治学低估了国家在界定利益时的主动性和自主性。

第二,开放经济政治学仅从物质主义的视角界定个体偏好,限制了利益的范围。为研究方便,开放经济政治学引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依据社会行为体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推断政策偏好。政治学家脱离政治制度和环境而直接从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模型中推导个体的政策偏好,等于直接将界定社会行为体利益的艰巨任务交给了经济学者,丧失了政治学理解利益的独特视角和学科优势。[⑤] 现实政治中的利益异常复杂,个体对政策的态度并不只受到自身物质

---

① Jonathan Kirshner, ed., *Monetary Orders: Ambiguous Economics, Ubiquitous Politic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② Jack Citrin and Donald Philip Green, "The Self-Interest Motive in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in Micropolitics*, Vol. 3, No. 1, 1990, p. 28.

③ Bruce Blonigen, "New Evid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Trade Policy Preferences," No. w1462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8, p. 5.

④ Kathleen R. McNamara, *The Currency of Ideas: Monetary Politics in the European Un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NicolasJabko, *Playing the Market: A Political Strategy for Uniting Europe, 1985—2005*,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Rawi Abdelal, "Writing the Rules of Global Finance: France, Europe, and Capital Liberaliz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3, No. 1, 2006, pp. 1-27.

⑤ Jonathan Crystal, "What Do Producers Want? On the Origins of Societal Policy Preference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9, No. 3, 2003, p. 419.

利益的影响,而是在社会互动中所形成的一定的规范、理念背景下产生的。[①]学者们开始通过实证观察的方法检验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偏好假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 D. Mansfield)等通过对美国公民贸易政策态度的两次全国调查和统计分析,发现"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和"李嘉图-维纳"模型的经验支持非常有限。美国公民对贸易对美国整体经济影响的认知比个人物质利益对贸易偏好的影响要大。[②] 同时,有学者对国际货币政策偏好的假说进行检验,也发现传统的部门偏好模型受到爱国情感和选民对于不同政策权衡的了解程度的重大影响。[③] 教育和社会情感因素对行为体偏好的影响也开始受到关注。有研究发现,高等教育所传授的经济理念和信息对于选民形成对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偏好非常关键。[④] 同时,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宗教和性别差异等社会情感对于选民的政策偏好也有较大影响。

第三,开放经济政治学通过国际分工地位界定国内行为体利益,将国际市场力量狭隘地定义为外生于政治过程的价格和信号传导机制,忽视了国际市场结构和国家政治权力对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塑造。国际经济学理论通常建立在"小国"和完全竞争的假定的基础上,即任何一个单元内部的生产和消费与全球总量相比都足够小,因而包括政策在内的所有行动都不会对世界价格产生明显的影响。这一假定源自以完全市场中的产业或产品为分析单位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但是,国际经济体系中国家的数量和等级与市场中的企业不同,拥有庞大生产规模和消费能力的大国可能会出于自身经济或政治目的扭曲国际价格,在现实的国际市场中,由于大国权力政治的存在,垄断和寡头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不仅如此,国家出于战略和安全的考虑,还会为国际市场设置各种人为的壁垒,来阻隔、引导和扭曲经济活动,进而影响价格机制。

2. 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制度学说存在缺陷。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制度学说也在新的实现背景下暴露其缺陷。开放经济政治学借鉴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将国内制度作为利益汇集和整合的渠道引入对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解释。

---

① David A. Lake, "Open Economy Politics: A critical Review," p. 231.

② Edward D. Mansfield and Diana C. Mutz, "Support for Free Trade: Self-Interest, Sociotropic Politics, and Out-Group Anxie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3, No. 3, 2009, pp. 425-457.

③ David H. Bearce, Kim-Lee Tuxhorn, "Are Monetary Policy Preferences Egocentric? Evidence from Two American Surveys and an Experiment," Prepared for IPES 2013 at the Claremont Graduate School, October 2013.

④ Jens Hainmueller and Michael J. Hiscox, "Learning to Love Globalization: Education and Individual Attitudes toward International Trad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0, No. 2, 2006, pp. 469-498; Robert Urbatsch, "A Referendum on Trade Theory: Voting on Free Trade in Costa Ric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7, No. 1, 2013, pp. 197-214.

同时,在国际层面,开放经济政治学探究国际制度如何影响国家间的战略互动及其结果,尤其是国家如何通过国际制度增强其承诺可信性。[①] 但是,开放经济政治学对于制度在全球经济中作用的理解也开始受到一些批评。

第一,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制度学说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为基础,将制度的功用狭隘地界定为折射和影响个体利益的汇集,[②]从而忽视了制度通过身份塑造改变行为体偏好的作用。制度作为行为体博弈的宏观背景,不仅影响行为体的战略手段,而且影响行为体的目标。社会行为体在权衡不同政策目标时,往往需要考虑组织成本和集体行动的问题。[③] 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国内制度变量主要拘泥于选区制、否决权的数量、选举制度、委托—代理问题和民主与透明度,而对于制度和社会的互动及资本主义多样性等包涵更复杂国家—社会关系的国内政治结构关注不够。[④]

第二,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分析框架建立在政治多元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将政治理解为社会偏好输入和国家政策输出的过程,这无疑忽视了政府机构的官僚利益和国家自主性对于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广大发展型和转型国家来说,国家主义或官僚政治可能比多元主义更能解释对外经济政策的形成。如何拓展已有制度分析对发展型和转型国家国内政治与全球经济的互动进行研究是未来研究的方向。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田野教授就区别于开放经济政治学的社会中心视角,将国家参与国际制度和国际合作的动力理解为政府为了打破既有均衡以增强国家自主性。[⑤]

第三,开放经济政治学将国际制度作为国家战略互动中传递信号和确保承诺可信的中性机制进行研究,过于注重国际制度增进国际合作的功用,忽视了国际制度的权力面孔。国际制度具有非中性,它本身就能成为主导国的权

---

① Darren G. Hawkins, et al., eds., *Delegation and Agency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② Geoffrey Garrett and Peter Lange, "Internationalization,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Robert O. Keohane and Helen V. Milner, ed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48-75.

③ Kathlleen R. McNamara, "Of Intellectual Monocultures and the Study of IP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6, No. 1, pp. 72-84.

④ 彼得·卡赞斯坦将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研究引入国际政治经济学,但后来发展起来的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分析框架显然无法容纳这种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彼得·霍尔仍继承着这一研究传统。参见 Peter Katzenstein, ed.,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 Peter Katzenstein, *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 Industrial Policy in Europ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Peter Hall and David Soskice,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⑤ 田野:《国家的选择:国际制度、国内政治与国家自主性》,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力工具。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贷款往往反映了美国商业银行和地缘政治利益。[①] 国际制度的权力特性使得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会努力提升自身对国际制度的影响力,开放经济政治学对于国家和私人行为体如何通过国际制度实现自身利益、影响国际制度决策还需要系统的研究。而且,除了正式制度之外,对于国际组织内部的网络政治、议题联系和私下交易这些非正式制度,开放经济政治学更是鲜有涉及。

3. 开放经济政治学在研究方法上有其局限性。开放经济政治学在研究方法上对于定量研究和博弈论的偏爱,也限制了其对于国际体系中更加复杂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进行有价值的探讨。正是因为开放经济政治学从经济学中大胆借鉴了对个体利益的界定,从比较政治学中借鉴了对国家制度的狭隘界定,使得这一分析框架可以在异常清晰和明确可见的个体利益和国内/国际制度的基础上,通过理论演绎和数据归纳来提炼一些明确的因果机制。这使得开放经济政治学更加接近于一门"科学"。但是源于对"科学"的过度迷恋,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形成了一种研究课题的选择性倾向,即对于那些能够采用定量方法和博弈论研究的课题表现得无比热情,并确实产生了一些重要成果,但这种方法驱动的研究,却使得开放经济政治学仍旧主要关注发达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根源和国际制度设计对战略互动的作用这两大议题,对于当前一些重大而紧要的现实问题则不能做出有效的知识回应。[②]

总之,在冷战结束后形成的单极霸权的背景下,由于国际结构的压力日益松弛,整个国际关系学理论研究出现了从体系层次向单元层次回落的趋势。[③] 在这一背景下,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致力于打通国际经济关系与国内政治过程的界限,他们以制度和利益为分析基础,从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中借鉴了大量分析工具,从而形成了开放经济政治学这一分析框架在20世纪90年代

---

① Thomas Oatley and Jason Yackee, "American Interests and IMF Lend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1, No. 3, 2004, pp. 415-429;李巍:《霸权国与国际公共物品:美国在地区金融危机中的选择性援助行为》,《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64—186页。

② 第一代学者基欧汉认为目前美国主流的开放经济政治学缺乏对全球重大变化的关注。他列出了目前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五个重大问题:(1) 东亚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真正崛起;(2) 中国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的重要玩家;(3) 金融和能源市场的波动更为极端;(4) 真正的全球行为体在世界政治中已至关重要;(5) 电子技术成为全球通信的基础,从根本上影响着全球政治经济事务。参见 Robert O. Keohane, "The Old IPE and the New,"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6, No. 1, 2009, pp. 34-46。

③ 李巍、王勇:《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回落》,《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3期,第112—142页。

后的压倒性地位。[①] 但是,正是因为开放经济政治学从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中借鉴了过多的分析工具、研究方法和基本概念,其在国际权力结构与市场体系之间的传统优势领域不断丧失,从而使得开放经济政治学越来越远离传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特征。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和 2010 年欧洲债务危机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界对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反思和超越。

四、超越开放经济政治学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全面反思,不少学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应该勇于面对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以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姿态去识别、描述和解释全球政治经济中的重要现实困惑。这预示着国际政治经济学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②]

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前,本杰明·科恩就挑起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美国学派"和"英国学派"的论战,认为在占压倒性的"美国学派"之外,存在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学术传统,而这种学术传统对于以开放经济政治学为主流研究路径的美国学派提供了重要的补足。[③] 两场危机后,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国际政治经济学共同体陆续出现了一些超越开放经济政治学既定研究纲领的学术成果。

(一)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议题的扩展

开放经济政治学集中探讨国内政治过程和国际既有制度框架下的战略互动,对金融危机暴露出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新问题疏于关注。因此,对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反思和超越首先体现在对其划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议题范围进行了新的扩展。

第一,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权力背景重新进入研究视野。不少老一代

---

① 有学者通过收集 1996—2006 年间《国际组织》和《美国政治学评论》上所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文,发现超过 3/4 的文章采用了开放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参见 Thomas Oatley, "The Reductionist Gamble: Open Economy Politics in the Glob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5, No. 2, 2011, pp. 314-315。

② 参见 Nicola Phillips and Catherine Weaver, ed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Debating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Blyth, Mark,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 IPE as a Global Convers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③ Benjamin J. Cohen, "The Transatlantic Divide: Why Are American and British IPE So Differ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4, No. 2, 2007, pp. 197-219.

学者曾对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中的大国权力和地缘政治因素进行过开创性的研究。[①]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美国在全球的金融霸权地位进一步巩固,这使得新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放弃了对国际金融和货币秩序的权力分析,而是专注于探讨金融自由化政策所带来的分配性后果和单个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②] 国际层面的分析仅限于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救援条件的研究。[③] 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美元储备资产的风险和美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也在危机中显现出来。与此同时,以人民币为代表的新兴币种纷纷开启国际化进程,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 2009 年 3 月发表的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文章激起了国际社会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争论。[④]

美国金融危机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提供了重新审视美国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及其后果的机会。开放经济政治学阵营之外的学者积极致力于探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及其改革前景,使国际货币政治研究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最迅速的研究领域。不仅如此,学者们对美国国际金融权力的来源及其持续性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同时,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与全球经济失衡的关系成为热烈的讨论话题。最新的研究已经开始对大国关系和国内政治如何影响国际经济再平衡的调整进行了开创性研究。金融危机之后启动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开始受到关注,不少学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及其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第二,跨国议题的国家治理差异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新兴领域。面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各国受影响程度和危机应对政策大不相同。比较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融合的重要体现应该是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治理模式差异进行比较研究。开放经济政治学将全球化带来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趋同

---

① Barry Eichengreen, *Golden Fetters: The Gold Standard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1919—1939*,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Benjamin M. Rowland, Brittain and W. H. Bruce, *Balance of Power or Hegemony: The Interwar Monetary Syste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6; Harold Jam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Cooperation Since Bretton Wood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6; Benjamin J. Cohen, *The Geography of Mone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② Jeffry Friden, "Invested Interest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in a World of Global Fin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5, No. 4, 1991, pp. 425-451. 中国学者的研究,参见曲博:《危机下的抉择:国内政治与汇率制度选择》,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③ Randall W. Stone, *Lending Credibility: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the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④ Gregory Chin and Yong Wang, "Debating the International Currency System: What's in a Speech," *China Security*, Vol. 6, No. 1, 2010, pp. 3-20.

作为核心研究主题,忽视了国家对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过滤作用,对于不同治理模式的政治动力和效果缺乏关注。两场危机又一次凸显出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公司治理和危机救助上的差异,使得发达国家受两场危机的影响程度和经济复苏速度都表现出明显的不同。资本主义多样性作为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重要成果被重新纳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开放经济政治学不仅忽视了资本主义内部面对全球化的不同治理模式,而且其以经合组织国家的经验作为主要实证来源,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关注严重不足。危机之后,不少国际政治经济学者通过实质意义上的跨地区研究,以实证案例的"多样性"克服学术研究中的偏见。①

全球化世界中国家的作用、国内政治结构和治理模式的差异是研究者必须尊重的事实。面对此次金融危机,巴西、印度、韩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危机后通过不同程度的资本管制对资本流动不稳定进行了有效的管理,隔绝了金融动荡对本国市场的影响。在金融监管领域,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并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指南,采纳"安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去管制化的金融监管,而是对金融机构采取了比较严格的监管。同时,不同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机构间的权威分布都非常不同。因此,超越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制度背景,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金融监管体制进行比较研究是未来研究的方向。②

第三,全球治理机制的重建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最为紧迫的研究议题。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暴露了既有全球治理机制的缺陷:一方面,既有的全球治理机制的运行效率严重不足,对于金融动荡缺乏预警机制,对于大规模资本流动缺乏有效监管,对于事后的金融危机也缺乏强有力的救援能力;另一方面,全球治理机制也正在遭遇合法性困境,危机救助和新一轮国际政策协调需要新兴经济体的广泛参与,而新兴经济体在主要国际机构中的代表性明显不足。正在此背景下,更具包容性的二十国集团在金融危机之后替代七国集团成为主要国际合作平台,但二十国集团仍然是一个非正式合作机制,依赖于其他正式国际机构进行政策执行。

---

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在 2010 年 12 月的专刊就以各地区不同类型的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差异性为主题展开研究,试图拓展全球范围的研究议题。

② Layna Mosley and David Andrew Sing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Lessons and Opportunities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35, No. 4, 2009, pp. 420-429; Eric Helleiner and Stefano Pagliari, "The End of an Era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gulation? A Postcrisis Research Agend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5, No. 1, 2011, pp. 169-200.

金融危机直接促生了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和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两大议题。国际金融监管改革一直作为二十国集团峰会的中心议题,也成为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向。[①]

新兴经济体对于隔离国际金融动荡、构筑金融安全网络和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等方面具有共同的需求,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危机后加强合作机制,通过非正式的金砖领导人峰会和建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提升自身影响力并倒逼多边国际经济机构改革。新兴经济体对国际经济治理改革的推动,促使学者们开始思考政治权力和经济理念如何相互作用影响全球金融秩序,并开始对新兴经济体通过金融外交,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行为进行理论化。

碎片化治理成为全球治理机制重建过程中的重要现象。金融危机后,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和围绕规则进行的权力斗争,使得多边国际组织的执行力面临挑战,多边国际合作愈发困难。区域性和双边性协定已经成为危机后主要的国际合作机制。双边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的蓬勃发展,使得全球投资和贸易治理被地区和双边协定网络主导。学者们对自由贸易协定和双边投资协定,尤其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样的巨型贸易协定对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重塑作用进行了热烈的探讨。

而在国际金融监管领域,各国采取协调一致的监管政策已经不可能,金融监管政策的多样化和本地化已经成为主要特征。不同监管体制导致的金融监管多样化,以及跨国私人企业在形成国际金融标准中的作用开始得到研究者的关注。

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推动了正式的国际制度的变革,而非正式的政策网络、[②]双边和区域合作机制也在不断兴起,各国都在全球治理机制的重构过程中角力。权力冲突和观念转变对于解释制度变迁非常重要。

---

① Daniel W. Drezner, *All Politics Is Global: Explaining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Regim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② 2014 年 8 月 28—31 日,在华盛顿举办的美国政治学协会(APSA)2014 年年会中,Lisa L. Martin 主持了一个关于国际组织中非正式网络的作用的讨论小组:Power Politics, Informal Politics, or Both?,其中代表性的论文有:Oliver Westerwinter, "Informal Governance, Networks and the Politics of Blood Diamonds," APSA 2015 Annual Meeting Paper; Randall W. Stone, Rabia Malik, "The Informal Politics of World Bank Lending," APSA 2015 Annual Meeting Paper; Elena V. McLean, "Informal Politics in Multilateral Aid Organizations and the Allocation of Contracts," APSA 2015 Annual Meeting Paper。

(二)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的丰富

美欧两场危机之后的国际经济秩序演进,体现了体系结构、国际制度和经济理念的变迁。开放经济政治学以个体主义、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假定为理论基础,坚持从国内政治出发解释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合作,已经偏离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的体系动因太远。对此,有学者认为这是一场"还原主义"的赌博。① 这种单一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框架限制了学术研究的视野,使其很难对正在兴起的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重建和国家治理的差异化进行有说服力的解释。很多学者批评这种学术单一文化,呼吁理论范式上的多元主义和学术研究的折中主义,②并为丰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努力。

第一,重新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纳入体系变量。在开放经济政治学中,体系层次的国际经济关系大多被当作需要解释的因变量,国内社会行为体在特定国内制度结构下进行的理性选择,被认为是解释的自变量。开放经济政治学过分倚重国内政治研究路径,使得国际政治经济学越来越远离诸如经济相互依赖和国际政治结构等体系层次的变量,忽视宏观进程和国际层面的解释视角,从而越来越向比较政治经济学靠拢。对此,罗伯特·基欧汉指出,目前的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际"(I)越来越受到淡化或压制,国际政治经济学逐渐被比较政治经济学甚至是政治经济学所取代。③

开放经济政治学将全球政治经济分解为一些子系统(国内政治体系)进行单独处理,认为国家的经济政策是在相互独立的情况下做出的,④偏离了国家政府生存于一个复杂的国际系统之中的事实。超越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需要理解国际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动力对危机爆发和对不同国家带来的分配性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学亟须第三股学术潮流的转变,即将国际宏观过程纳入国内政治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这些宏观过程意味着

---

① Thomas Oatley, "The Reductionist Gamble: Open Economy Politics in the Glob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5, No. 2, 2011, pp. 311-341.

② Peter J. Katzenstein, "Mid-Atlantic: Sitting on the Knife's Sharp E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6, No. 1, 2009, pp. 122-135; Kathleen R. McNamara, "Of Intellectual Monocultures and the Study of IP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6, No. 1, 2009, pp. 72-84.

③ Robert O. Keohane, "The Old IPE and the New," p. 39.

④ Beth A. Simmons, Frank Dobbin, and Geoffrey Garrett, "The Institutional Diffusion of 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0, No. 4, 2006, pp. 781-810; Thomas Oatley, "The Reductionist Gamble: Open Economy Politics in the Global Economy," pp. 313-314.

强调和关注体系层次的力量和因果机制,这些力量和机制可以是政治的,比如国际权力结构、强制和制裁行为、安全联盟体系和政治集团因素;也可以是经济的,比如经济传染、网络外部性、要素垄断和经济失衡等,或者是观念的,比如扩散、学习、内化、冲突和抵制等。

对此,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最新一批成果体现了这一转变。国际体系层面的政策扩散效应开始得到更多的关注,①同时,也有学者开始运用网络分析方法分析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结构和动力。②

第二,重新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找回国家权力。对国家权力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作用的分析,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独特优势,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区别于经济学的根本学科基石。在开放经济政治学的框架下,传统的政治和权力要素在日益下降,国内个体的理性选择被置于至高的地位。受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利益—制度"的分析框架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国内层次的分配效应,而几乎完全忽视了国际经济活动在国家间的分配效应,以及国家为了改变不利的分配结果而产生的利益冲突和权力运用。对此,康奈尔大学教授乔纳森·科什纳(Jonathan Kirshner)批评道,国际政治经济学正在演变成 IpE, 即政治的概念在逐渐萎缩甚至消失,而这正是20 世纪60 年代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危机的再现。③ 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交叉学科的意义正在于将国际政治带入到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理解,将政治权力和市场力量的互动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而开放经济政治学正在远离这一传统。

对此,不少学者强调,国际政治经济学需要进一步探索国家对权力与利益

---

① 关于跨国政策扩散的相关研究,参见 Beth A. Simmons and Zachary Elkins, "The Globalization of Liberalization: Policy Diffus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8, No. 1, 2004, pp. 171-189;Beth A. Simmons, Frank Dobbin, and Geoffrey Garrett, "The International Diffusion of Liberalism," pp. 781-810; Katharina Holzinger, Christoph Knill and Thomas Sommerer, "Environmental Policy Convergence: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Harmonization, Trans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Regulatory Competi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2, No. 4, Fall 2008, pp. 553-587.

② 关于网络分析方法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应用,参见 Miles Kahler, ed., *Networked Politics: Agency, Power, and Governa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Thomas Oatley, et a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 Finance: A Network Model,"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11, No.1, 2013, pp. 133-153; Ranjit Lall, "Timing as a Source of Regulatory Influence: A Technical Elite Network Analysis of Global Finance," *Regulation & Governance*, Vol. 9, No. 2, 2015, pp. 125-143。

③ 20 世纪60 年代,美国国内学界对于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国际经济事务仍旧受到政治正确的限制。因此,罗伯特·吉尔平也曾经被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参见 Jonathan Kirshner, "The Second Crisis in IPE theory," in Nicola Phillips and Catherine Weaver, ed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Debating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 204。

的追求、对战争的关切,以及集体和非经济目标是如何影响国际经济秩序。[①]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教授和斯坦福大学的朱迪思·戈德斯坦(Judith Goldstein)等人呼吁要重新回到对国家权力在全球政治经济中作用的探讨。[②] 尽管市场权力和垄断权力在经济学文献中早已存在,但是经济学家往往对于市场权力如何侵蚀政府的监管权比较感兴趣。[③] 而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权力因素则要丰富得多,它不仅是物质的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而且包括宏观经济决策模式的社会建构性权力。[④]

第三,重新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拾起经济理念。古典政治经济学、经济社会学、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对于观念、价值、意识形态甚至情感、心理等社会因素在经济实践的影响有着深厚的研究传统。但是,开放经济政治学以理性主义为其核心假定,对于经济理念、市场不确定性和文化因素在国际经济中的作用持排斥态度。理念视角不仅解决了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变迁的困境问题,而且理念构成影响行动者偏好的重要因素。理念的视角为传统的利益与制度互动加入了新的一端,使制度主义的研究更加具有解释力。同时,国际社会中的理念不仅源于国家之间的社会化实践,而且源自国内的文化、传统及社会力量的互动。这就不可避免地将国际层次与国内层次联系在一起。[⑤] 观念和历史的制度主义为我们理解金融危机之后国际金融秩序的变迁、国家治理模式的差异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重建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益的视角。[⑥]

---

① 处于开放经济政治学群体之外的一些学者对于地缘政治对国际经济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参见 Jonathan Kirshner, *Currency and Coerc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Jonathan Kirshner, ed., *Monetary Orders: Ambiguous Economics, Ubiquitous Politic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Benjamin J. Cohen, *The Geography of Mone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Daniel W. Drezner, "Bad debts: Assessing China's Financial Influence in Great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2, 2009, pp. 7-45; Francis J. Gavin, *Gold, Dollars, and Power: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lations, 1958-1971*,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

② Martha Finnemore and Judith Goldstein, eds., *Back to Basics: State Power in a Contemporary Worl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③ Pauland Milgrom and John Roberts, "Limit Pricing and Entry unde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An Equilibrium Analysis," *Econometrica*, Vol. 50, 1982, pp. 443-459.

④ Daniel W. Drezner and Kathleen R. McNamara,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Global Financial Orders and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11, No. 1, 2013, p. 158.

⑤ 朱天飚:《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学科互动:一种理念的研究视角》,《国际观察》2013 年第 4 期,第 22 页。

⑥ Orfeo Fioreto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5, No. 2, pp. 367-399, 2011.

金融领域为我们观察观念、认知因素在国际市场运行中的作用提供了试验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流动管制的观念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进程,国际金融理念从强调资本管制的“内嵌式的自由化”演变为鼓吹资本自由化的华盛顿共识,又演变为承认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有效管理。[①] 关于国际金融监管的严格程度和监管主体的理念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到此次金融危机也经历了两次变化。[②] 这些经济理念变迁的政治基础和影响需要进一步探讨。

最后,新一波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正在从“方法导向型”向“问题导向型”研究转变。面对危机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和各种新兴的复杂现象,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需要改变对定量研究方法和博弈论的偏爱,直面现实世界的变化和丰富的新议题,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进行学术探索。

通过大样本统计,对理论假说进行统计检验,进而建构中层理论,是开放经济政治学采取的主要方法。按照科恩的说法,出于一种“同行的嫉妒”,开放经济政治学向新古典经济学“叩首”,主动向经济学的专业主义和科学主义靠拢。[③] 它在降低理论复杂性的同时,确保了理论的实证基础,但也因此付出了代价。对定量研究方法的偏爱,使得研究方法而非问题的重要性成为研究选择的尺度,这偏离了学术探索的目的。科什纳认为,开放经济政治学沉醉于圈内的方法论主义,学术探索本身成为技术性方法的婢女,呼吁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用问题导向取代方法导向,方法应该为研究问题服务,而非问题屈从于研究方法。[④]

开放经济政治学对定量研究方法的过度偏爱,不仅限制了对有意义的研究问题的选择,还会制约学术探索的深入。定量研究的优势在于发现变量的相关性,它本身难以对因果机制进行有力的说明。正如芬尼莫尔所言,我们不只要力求建构内在一致的通则性规律,更需要探索相关的因果机制。这些因果机制虽然经常不完美,但是有用的,我们可以判断这些机制在何种条件和范

---

① Rawi Abdelal, *Capital Rules: The Construction of Global Fina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2009; Jeffrey M. Chwieroth, *Capital Ideas: The IMF and the Rise of Financial Liber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② Eric Helleiner and Stefano Pagliari, “Crisis and the Reform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gulation,” in Eric Helleiner, Stefano Pagliari, and Hubert Zimmermann, eds., *Global Finance in Crisis: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Change*, pp. 1-19.

③ Benjamin J. Cohen, “A Grave Age of Myopia,”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35, No. 4, 2009, pp. 436-444.

④ Jonathan Kirshner, “The Second Crisis in IPE Theory,” in Nicola Phillips and Catherine Weaver, ed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Debating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p. 207.

围下可以发挥作用。[①]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是现实世界复杂性对学术探索的要求。而案例研究、档案、访谈、调查问卷、实验和文本分析等形式多样的研究方法为我们解释个别重大事件和数据不充分的重要问题,探究其中的因果机制提供了另外的路径。

总之,美国金融危机及其之后的国际经济秩序变迁,对开放经济政治学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构成了严重冲击。无论是在研究领域、研究视角还是研究方法上,正在出现的新一波知识成果都在不断超越开放经济政治学的狭窄而封闭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框架,这给一度"沉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重焕生机和活力提供了希望。

结　　语

从宏观理论的范式之争演进到强调中层理论的开放经济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过去 40 年里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交叉学科和分支学科,并且形成了两代学者群体。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两波大的知识浪潮的形成都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变迁息息相关。

开放经济政治学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建立在严谨演绎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并通过对利益和制度这两个基本概念进行高度简化和可操作性处理,使得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科学性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但同时因为开放经济政治学更多强调研究方法上的精确性及研究手段上的进步,它因而丧失了对重大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及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演进方向的宏观关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枯燥"和"乏味",这也导致了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大多以"学术工匠"著称,而在整个一代学术群体中都缺乏耀眼的"思想巨人"。

金融危机之后学者们反思和超越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努力,试图探索全球经济中复杂的新问题提供开放的视角和多元的方法。这些努力目前还没有形成独立于开放经济政治之外的知识框架,但是能够修正开放经济政治学研究的单一性和封闭性,从而有可能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三波知识浪潮的到来。

---

① Henry Farrell and Martha Finnemore, "Ontology, Methodology, and Causation in the Americ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6, No. 1, 2009, p. 66.